

西漢年紀

「宋」王益之 撰 王根林 點校

中州古籍出版社

94
K234.104.3

1
2

〔宋〕王益之 撰
王根林 整理

西
漢
年
紀

B127 / 6

中州古籍出版社



C

014036

(豫)新登字05号

内 容 提 要

《西漢年紀》三十卷，附《考異》十卷，宋王益之撰，是一部西漢時代編年體的重要史書。它以《西漢書》、《漢書》的紀、傳、志及荀悅《漢紀》、司馬光《資治通鑑》、杜佑《通典》、衛宏《漢舊儀》、漢武故事等多種著作的有關內容，按年月精心撰述。考異則對上述諸書，作了大量的匡謬補正，由此而提高了該書的科學性及史料價值。同時，該書還保存了一些散佚著作的珍貴史料，是一部研究西漢歷史的重要文獻。

西 漢 年 紀

[宋] 王益之 撰

王根林 點校

責任編輯 趙智海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鄭州市農業路73號)

新華書店經銷 河南孟津縣印刷廠印刷

850×1168毫米 32開本 21印張 378千字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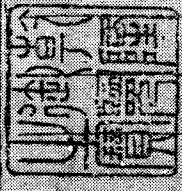
印數001—1100冊

ISBN7-5248-0035-2/K·5 定價16.00元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王莽傳 王莽之撰
孝成皇帝崩時太子嬰年二歲而宣帝崩太子
嬰年壯好經書莽始居攝政元年五月无帝崩
六月王莽即皇帝位詔賜尊號太后曰太皇太
后皇后曰太皇太后莽以兄子衡為大將軍封
大司馬大將軍領攝政事每封王莽之與自
鳳始初許嘉自元帝時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
已九年矣及帝薨復以鳳與嘉並柱欽以為故事后
父重哀帝弟又說鳳曰車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之敬
之毋失其意蓋輕納微眇之新必生乖許之患不可不
慎衡將軍之日盛於漢侯近世之事語尚在於長老之
耳唯將軍家為許望提騎馬都尉侍中史丹為長樂衛
尉有司奏大鴻臚馮野王王舅不宜備位九卿以扶
出為上郡太守諸曹馮立出為五原侯國都尉黃門郎

二人所符或召行其言耳本九以為益壽
十五而通更作什二今從父死存十五
夫果邱毀為少府百官珠崖三縣反之象
神爵四年潯川太守黃霸在郡前後公平政事食活是
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潯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
者夏四月下詔曰潯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郡國曰
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因著讓畔道不拾遺
恭親饒恭昭助貧賤或父年亡重罪囚吏民鄉子表
化與子行誼可謂賢金君于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
欽定四庫全書
賜將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及潯川吏民有行
表者爵父一級力田一級貞婦順女帛後數月徵霸為
太子太傅本九令均郡國果賢良可觀民者各一人好
是歲河內太守章不成為衛尉百官

文淵閣本西漢年紀書影(二)



前言

南宋王益之（字行甫）編撰的西漢年紀三十卷（附考異十卷），是一部編年體的西漢斷代史。由於記述西漢歷史的史籍，已有紀傳體的史記、漢書及編年體的荀悅漢紀、司馬光資治通鑑在前，致使西漢年紀未能廣泛流傳，沒有受到史學界的應有重視。似乎至今還沒有見到過一篇研究西漢歷史或史籍編年體的論文，引用或提到過它。這是十分可惜和不公正的。其實，西漢年紀寬徵博引，精心考辨，把西漢一代大事按年代順序予以合理編排，史料翔實，條理清楚，篇幅適中，繁簡得當，於中又對上述四書的疏誤，作了大量補正。此外，它還具有保存佚失的珍貴史料、校正其他古籍等多方面價值。它和荀紀、通鑑同為編年史，又同樣以史漢為主要素材。但荀紀是「抄撰漢書、略舉其要」（荀悅前漢紀序）而成，只是班書的一個節略本。加之當時還沒有形成史料考訂的風氣，所以錯訛牴牾之處甚多。通鑑是一部體大思精的史籍巨構，但也存在着內容疏漏、繫年失當、文字錯訛等問題。（明人嚴衍曾殫三十年精力對之進行全面辨正，糾誤甚多）「前修未密，後出轉精」，西漢年紀可以吸取通鑑之長而糾正其短。通鑑漢紀的西漢部份，與西漢年紀同為三十卷，而二書在

內容重點、史料的取舍和剪裁等方面，頗有不同。故西漢年紀的文獻價值，並不在通鑑漢紀之下，二書正可互為補充，參照研讀。西漢年紀也理所當然地應該成為人們學習、研究西漢歷史的主要文獻之一。

我國古代史書的體裁，經歷了自初級向高級發展的過程。春秋戰國時代，是編年體的獨盛時期。自司馬遷首創紀傳體通史史記，後代史家相踵仿作，於是紀傳體逐漸取代編年體，成為記史著作的主流。到北宋司馬光撰成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在史學界又掀起一股「編年熱」。當然，這並不是簡單的「復古」或「周而復始」，而是一種螺旋式的上升。拿通鑑為代表的編年史與先秦時期的編年史相比，形式雖然相同，却實現了質的飛躍。西漢年紀就是在這種形勢下誕生的。王益之之對紀傳體與編年體的優劣，有着自己獨特的看法。在西漢年紀的自序中，他寫道：

王仲淹（即王通）曰：「史之失，自遷、固始。」或問荀悅，曰：「史乎，史乎！」余三復斯言，未嘗不廢卷而嘆也。蓋自秦離降而為國風，國異政，家殊俗，天下不復有周矣。詩亡然後春秋作，夫子冠王於正，以示一統，所以立萬世君臣之大法也。遷、固易編年以為紀傳，事之大較雖繫於紀，而人臣之議論功勳自見於傳。殊不知孔子當列國紛紜之際，首王綱以明大義；遷、固於大漢一統之時，顧使人自為傳，臣自為功，毋乃非春秋

之旨歟？……

或病余曰：「紀傳之作尚矣，子願欲廢之，可乎？」答曰：「不然。紀傳存一人之始末，論人物者有考焉；編年著一代之升降，觀治亂者有稽焉。以一人之始末視一代之升降，重輕何如也？」……

這裏，體現了作者這樣兩個觀點：一是維護國家大一統的思想。他是從政治角度來評判編年體與紀傳體的。他推崇孔子於「列國紛紜之際」，「冠王於正，以示一統」；批評司馬遷，班固於漢朝一統之時，反而用「人自爲傳，臣自爲功」的紀傳體，是有違春秋之旨的。作者生活在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於此可能寄託了他收復故土、統一全國的願望。當然，由於缺乏有力旁證，這只能作爲一種推測而已。二是從總體觀察歷史的觀點。認爲紀傳體擅長記述人物，編年體擅長表現整個朝代的發展脈絡，於中可以考察國家興衰、社會治亂。而任何個人，都不過是社會肌體的細胞，孰輕孰重，不言而喻。這些觀點，都頗有見地。但他爲充分肯定編年體而激烈批評紀傳體，則有失偏頗。

在序言中，王益之介紹了該書的體例：

史傳互載，不無牴牾，因爲訂正，爲考異十卷；諸儒之議，多所發明，因爲詮次，爲鑒論若干卷。考諸年紀，一代之升降著矣；求諸考異，一時之去取見矣；參諸鑒論，當時

之事情得矣。

可知這是一個以年紀正文爲中心，又配備考據和評述兩部分附件的「系統工程」。這種作法，始創於通鑑。王益之根據年紀的具體情況，編寫了考異和鑒論兩部份輔翼之作，從史料考證和歷史評論兩個方面，加強了此書的科學性和實用性。值得指出的是鑒論的編制。由於它已散失，具體內容已不得而知。據其序所云，可知它是按一定原則輯集歷代學者對西漢歷史的評論而成的，目的是爲後代提供借鑒。此舉爲通鑑所無，體現了王益之在學術上的獨創精神。考異和鑒論原是各自爲書的，今本考異則一遵胡三省注通鑑時將考異附於正文之下的做法，分別附於有關正文之下，估計乃後人予以組合。

現在所見最早的西漢年紀，是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中輯出之本。它脫佚頗多，作者序言云「起於高祖，終於王莽之誅」，但此本僅止於平帝之死。鑒論已全部散佚。卷四「呂后」僅存三千餘字（其他各卷皆一萬多字），其中呂后三年全年缺載。至於零星的字句缺佚，就更多了。估計它在輯入永樂大典以前，已自殘缺不全。

年紀內容的次序是：正文，資料出處，考異，按語。正文以外三項皆爲小字雙行。其中資料出處，爲注明史、漢、荀紀、通鑑或其他被引之書的具體章節。這較同樣輯自永樂大典的舊五代史只注被輯之類書的卷次，更便於讀者檢核原文。按語內容，大致有四類：

一、據史、漢、荀紀、通鑑指出該段「疑有脫漏」，但不作補錄。二、補綴正文脫漏。三、調整正文的次序。四、發表與考異的不同意見，形成「對考異之考異」的格局，不啻是一篇反複駁難的考證短文。這一類的學術價值較高，其中不乏精闢之見。按語的作者，應該是負責從大典中輯纂年紀的四庫館臣。但是此書沒有明文標出輯纂者姓名，如舊五代史明確指出由邵晉涵輯纂的那樣，只在部份卷首鐫有「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字樣。估計主持輯纂工作的，可能就是謝振定。即使他不是主持者，但參與輯纂工作，大概是有問題的。然而，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首」所開列「辦理四庫全書在事諸臣職名」的「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兼分校官」一欄三十九人中，却無謝振定之名。而負責從大典輯纂舊五代史的邵晉涵及「詳校官編修黃壽齡」及「覆勘王坦修」，則皆有之。但在「繕書處分校官」一欄中，却有西漢年紀覆勘孫球之名。四庫全書修成進呈時是否會把謝氏之名遺漏了呢？這種可能性似乎是很小的。究竟是什麼原因，尚待考證。謝振定，字一齋，又字薌泉，湖南湘鄉人，清史稿有傳。乾隆四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五十九年，考選江南道監察御史，六十年，遷兵科給事中。為人耿直敢為。一次，權貴和珅妾弟乘違制車聘於衙，謝振定執訊而痛笞之，並焚其車，人稱「燒車御史」。

考異十卷，是西漢年紀的精華所萃。通鑑二百九十四卷，考異三十卷，約為十比一；年

紀三十卷，考異十卷，爲三比一。這說明王益之治史認真細心，善於發現問題。他對考異工作，既十分積極，又非常審慎。對某些有疑問而又難以遽定的內容，寧可付之闕如。其考辨手段，除本證、他證外，還充分運用了版本校。他參校的漢書版本，有川本（蜀本）、監本、兩浙錢王寫本、南唐本、唐本等多種。這爲研究漢書版本的嬗遞流傳，提供了新的線索。另外，王益之還注意吸收當代學者對西漢史的研究成果。以司馬光修通鑑爲契機，宋代對漢史的研究出現過一股小小的熱潮，其中最著名的學者是所謂「三劉」，即劉敞、劉攽、劉奉世，還有吳仁傑、胡寅、呂祖謙等，他們對漢史研究都頗有成就。對此，王益之皆多所借鑒。甚至連他們在通信中研討漢史的內容，也被採擷入考異之中（見年紀卷二「高帝十年」）。

考異的內容十分廣泛，舉凡史實繫年、職官置廢、地名演變、人物事蹟、文字訛誤，都包括在他考辨的範圍之內。由於他治學嚴謹，悉心以赴，考異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下舉其訂正漢書疏誤三例，以見一斑。

（一）漢書孝成許皇后傳載成帝報許后曰：

「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五月庚子，烏焚其巢太山之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南搖祖宗廟寢……四月己亥，日蝕東井……」

其中「五月庚子」於時序是有問題的。考異曰：

今許后傳作「五月庚子」。按，荀紀及五行志並作「二月庚子」。及考此書，先云「五月庚子」，繼云「三月癸未」，又云「四月己亥」，不應置三月、四月於五月之後，當是「二月庚子」爲是。今從荀紀、五行志。

(二) 中華書局標點本漢書李尋傳載哀帝建平二年詔書：

「……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

「元將」二字排小字加括號。其校勘記云：「景祐、殿本都無『元將』二字。」遂將「元將」三字刪去。考異曰：

哀紀、李尋傳並作「太初元年」，無「元將」兩字。今唐本哀紀有之，然。武帝即有太初矣，哀帝不應復以紀之，恐或有「元將」兩字，因存之。今川本本紀亦有「元將」二字。

(三) 漢書梅福傳：

……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勢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及山陽之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

據漢書成帝紀載，永始三年（公元前十四年）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而漢書百官公卿表又載陽朔三年（公元前二十二年）「八月丁巳，大司馬鳳薨」。這樣就出現了梅福於王鳳在世時提前九年知道蘇令叛亂的怪事。考異曰：

（梅福上書事）荀紀載於陽朔元年（前二十四年），蓋附於王鳳殺王章之後也……書中既言蘇令，則是蘇令已反之後上此書無疑，不應於陽朔元年預言蘇令反也。其書所以言王章者，正以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事爲諱，自殺王章始也。孟堅但見書中說王章，故於梅福上書之前序曰：「（即上引）是時……羣下莫敢正言」一段。」按，年表鳳死於陽朔三年，至福上書時，則鳳已死九年矣。傳所載非是，今不取。

上引三條中，第一條，中華書局標點本漢書許后傳仍作「五月庚子」，是爲失校。第二條，標點本哀紀有「元將」二字，李尋傳却刪去，殊誤。我想標點本漢書如能注意汲取西漢年紀考異的成果，一定能改正不少錯誤。第三條，王益之不但指出荀紀、漢書的錯誤，而且分析了其致誤之因，很有說服力。同時說明漢書本身也有疏誤，需作進一步考辨。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此不贅舉。四庫提要說此書：「至所作考異，於一切年月舛誤，記載異同，名地錯出之處，無不參稽互覈，折衷一是，多出二劉刊誤、吳仁傑補遺之外，尤通鑑考異所未及，其考證亦可謂精密矣。」並非過譽之詞。

年紀主要取材於史、漢、荀紀、通鑑，同時也引用了許多其他古籍。這些引文，除能補綴上述四書內容之缺和用來進行考辨外，還具有核正今本古籍的作用。比如卷十八「昭帝始元六年二月」記述鹽鐵會議一段，就有不少地方可正今本鹽鐵論之誤。同時，它又保存了一些久已佚失的珍貴史料。這方面突出的例子，是卷十二「武帝」所補一條資料：

（元光）五年冬十月，河間王德來朝。德有雅材，以爲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對三雍宮，文約指明。帝色然難之，謂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則縱酒聽樂。（小字注：漢名臣奏所載杜業奏。）春正月，薨。

接着，考異曰：

帝語班、馬不載，而見名臣奏。蓋河間王，栗姬子，太子榮同母弟也。榮廢而武帝立，固已不能無疑於栗氏子矣。況德賢明如此，而屬又稱兄，此帝之所以尤不能無忌也。德知其意，曾未三月，而繼之以死，蓋等死也。當時之事勢如此，而史氏不載，幸其軼見於他說，故後世得商其情焉。以是推之，史所諱晦，因以湮沒而不傳者，亦何可勝數！豈獨此哉，豈獨此哉！

司馬遷和班固可能出於「爲尊者諱」，未錄武帝這幾句十分重要的話。王益之之對此極爲感慨，並以努力勾稽原始史料爲己任。漢名臣奏，隋書經籍志史部有著錄，爲晉代陳壽（即三

國志的作者）撰，凡四十卷。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的「乙部史錄刑法類」亦有記載，但爲三十卷或二十九卷。而宋史藝文志未見著錄，司馬光通鑑亦未引用，可見此書在宋代已極罕見。由於王益之的多方蒐集，這條珍貴的史料才被保存下來。

關於王益之的身世，現在所能見到的資料實在太少了。王益之及其父王師古，宋史皆未列傳。王益之的名字，在宋史僅一見，即藝文志史部職官類：「王益之，漢官總錄十卷，又職源五十卷。」王師古則一次也未見。只有元吳師道敬鄉錄（收入清胡宗樸所編續金華叢書）卷十二，爲我們留下了有關王益之生平、家世的點滴史料。據此得知：王師古，字唐卿，金華人，紹興甲戌進士。嘗爲南劍州學教授，後守九江，除廣東提點刑獄，卒。有文集及資治通鑑集義八十卷。有子七人：謙之、恭之、益之、觀之、有之、渙之、節之。王益之，字行父（甫），淳熙丁未進士，仕至大理司直。據敬鄉錄所附王益之職源序「頃予尉分水縣」句，知他曾爲分水縣縣尉的小官。另外，據益之弟觀之所撰西漢年紀跋「嘉定辛巳鋟木於夔漕治所」句，知益之晚年曾主夔州漕司。宋會要輯稿的「選舉」和「刑法」部份，也載有王益之的兩條史料，得知他於開禧三年二月二十五日，被任命爲朝廷詮試公試類試的「考校」；同年三月二十六日，他以「大理司直兼評事」的身份，被命與羣臣集議吳曦謀反應得刑名罪狀。以上就是我們現在所能了解的有關王益之生平、家世的大致輪廓。

王益之的著作，共有三部，即西漢年紀三十卷，漢官總錄十卷，職源（原）五十卷。漢官總錄，據王觀之年紀跋，大約是益之中年時撰。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六介紹此書云：「大較亦如前書。」所謂「前書」，指徐筠漢官考，陳氏介紹此書云：「以百官表、官制為主，而紀傳及注家所載，皆輯而錄之。」這也是漢官總錄的內容梗概。職源五十卷，據其序，除了主要編撰人王益之，還有四個人也「分任其事」：徐澄（清伯）、仲質（文）、倪瑀（秀叔）、王觀之（中甫）。陳氏書錄解題介紹此書云：「亦簡牘應用之書，而專以今日見行官制為主。蓋中興以後，於舊制多所併省故也。」

關於西漢年紀的版本，據王益之弟王觀之在年紀跋語中述，最早是於南宋「嘉定辛巳（一二三二）」鋟木於夔漕治所。「明初尚有傳本存世，被輯入永樂大典。清乾隆中編修四庫全書，又自大典中輯出此書。是為今日所見之最早的版本。其文淵閣藏本，半頁八行，行二十一字，部份卷首鈐有文淵閣藏書印，部份卷末有「乾隆御覽之寶」印（見本書所附書影）。書中用改字和缺筆兩種方法避諱。清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浙江永康胡鳳丹由友人徐小雲自京都購得武英殿聚珍版西漢年紀，「為校勘而重鋟之」，作為金華叢書的一種刊行。其書半頁九行，行二十字。一九三六年六月，商務印書館又將金華叢書本西漢年紀編入叢書集成初編，加句逗排版印行。如此，現今可見的西漢年紀，就有四庫全書本、武英殿

本、金華叢書本和叢書集成本四種。武英殿本當出自四庫本無疑。叢書集成本出自金華叢書本，且排印錯誤甚多，不足為據。

金華叢書本經過胡丹鳳的校勘，改正了四庫本的不少錯誤。雖然還存在漏校、錯校的情況，但仍具有校勘價值。

這次標校整理，以四庫本為底本，以所引史、漢、荀紀、通鑑及其他古籍有關內容和金華叢書本作通校進行的。校改原則：凡原本誤而他書不誤者，據改，出校記。凡原本與他書文義不同而不能遽定是非者，不改，出異同校；文異而義同者，不改，亦不出校。對避諱文字的處理，凡改字避諱，即「弘」改作「宏」（避清高宗弘曆諱），「玄」改作「元」（避清聖祖玄燁諱），「丘」改作「邱」（避孔子諱），一律改成原字。凡缺筆避諱，即帶偏傍的「玄」（「弦」、「絃」、「絃」）缺最後一點；「華」缺最後一豎，皆避玄燁嫌名，一律補上最後一筆。原本以一年作為一個自然段落，嫌太長，整理中按其內容作了更細的分段。

對這次標校整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熱切期望專家及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王根林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日